刊》，给每一位公私立书馆的学生参阅。育才书社的毕特校长，便利用这种战时画报，作为施教题材，并配合该校附设图书馆的各种书报，使学生的常识增加不少。这种与实际问题相配合的教学，即使以现在的新教学观点而论，仍是最值得称赞的。”

第二节　广州办学风波

育才書社白告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四，刘铸伯在《香港华字日报》上发布《育才书社告白》

育才书社在香港的两所书馆，办理比较顺畅，得到了当地绅商的支持。同年，刘铸伯陪同伊利士·嘉道理前往上海，推动申江办学事宜。1901年6月23日，刘铸伯在《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启事：“本书社主席伊利士·嘉道理先生，日前亲自赴沪，联合同志诸君，在申设立书社分局，各书塾今当开办伊始，理宜赶速，以观厥成为快。前蒙本港善士捐助各款，敢请早日送交万祥源阮荔邨翁，或隐行办房梁仁甫翁，或弟处代收，取回收条便妥。”

此次上海之行，收获颇巨。刘铸伯与伊利士·嘉道理拜访了徐润、唐杰臣等香山买办与粤籍官绅，设立育才书社上海分局，成立了董事会，公举名望卓著的官绅、殷商担任总董、襄总董、办事总董、司银钱董、管理董事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四，刘铸伯在《香港华字日报》上发布《育才书社告白》，全文如下：

敬启者：本书社主席伊利士·嘉导理先生，日前亲自赴沪，联合同志诸君，在申设立书社分局，兹将就地公举总理芳名列左。书局今当开办伊始，理宜赶速，以观厥成为快，前蒙本港诸善士捐助各款，早日送交万祥源阮荔邨翁，或□行办房梁仁甫翁，或弟处代收，取阅收条便妥，此布。

沪江总理芳名列左：

总　董：钦差出使日本大臣四品京堂蔡和甫观察、苏松太兵道袁海观观察、候选道严筱舫观察。

襄总董：徐雨之翁、唐杰臣翁、韦文圃翁、郑陶斋翁、

陈辉廷翁、朱葆一翁、何瑞京翁

办事总董：梁钰棠翁、李云书翁、郁屏翰翁、苏实森翁、祝兰舫翁。

司银钱董事：席正甫翁、沈吉成翁、叶明斋翁。

管理董事：惠亭雨翁、叶慎斋翁。

副　董：陈仁甫翁、周伟臣翁、王锡和翁、陆云逊翁、张叔和翁、何丹书翁、颜勉夫翁、顾敬斋翁、叶松卿翁、周舜卿翁、韦仲卿翁、唐翘卿翁、金绍堂翁、吴少卿翁、吴调卿翁、胡寄梅翁、袁丁庄翁、黄省三翁、周湘云翁、汤子庄翁、徐子元翁、徐叔屏翁、方叔涛翁、俞安德翁、赵馥畴翁、张麟魁翁、吴仁甫翁、费鸿生翁、陈炳谦翁、陈蔼庭翁、谭干臣翁、沈子华翁。

光绪廿七年六月廿三日

育才书社司理人　刘铸伯　谨启

育才书社沪江总理、总董、襄总董、办事总董、司银钱董事、管理董事、副董，这些人物非富即贵，徐雨之即徐润，大名鼎鼎的香山买办。唐杰臣是容闳同窗密友唐廷植的长子，13岁入选为中国第四批幼童留美学习，归国后接任其父怡和洋行总买办职。历任上海自来水公司总董、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董、广肇公所总董，开办新式医院和学堂，提倡科学技术活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在上海与外国人公开辩论，捍卫民族权益，时人传为美谈。

出任总董的则是清一色的官吏，比如，蔡钧（生卒年不详）浙江仁和人，字和甫，1897年7月以后任上海道台。次年2月28日和3月4日，驻沪领事团和法国领事白藻泰分别提出扩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要求，均遭其拒绝。4月底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任，督办吴淞开端口工程总局。6月底，法国领事又向其交涉办理转移四明公所产权手续，以便起造学校和医院。因违背1878年协议，遭拒绝。法方单独采取行动，致发生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法方乘机提出酝酿已久的扩张租界要求。清廷因蔡对此事态度强硬，在公使团的压力下，于1899年将其撤职。1901年又以四品候补京堂任驻日本公使。1903年为防止知识界受民主思想的影响，电请清廷停派留日学生。当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赴内地参加拒俄运动时，蔡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请“饬各州县严密查拿”。7月，被清政府召回，在上海办《南方报》，为中英文合刊，1908年2月停刊。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有“雅谑与笑柄”一节，说到了“马格礼斯”的趣话：“蔡和甫为上海道时，与长江提督李占椿为亲家。和甫号通洋务，惧人言其不学，发言好用成语。偶闻客谈冯子材战功，谓此老时有马革裹尸之志，蔡意为诙词，因谓李曰：‘亲家将来必马革里尸。’李瞠目不知所对，退而叩人：‘马格礼斯，在英文作何解？’盖李固莫辩何言，而蔡又误裹为里也。”

育才书社在香港、上海开办的两所书馆，办理情况比较顺畅；而在广州方面，刘铸

伯等早已联名函禀两广总督陶模，说明育才书社开办原委。

陶模，字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七年进士，光绪十七年授新疆巡抚，光绪二十一年署陕甘总督，二十六年调补两广总督。戊戌前，他在督抚中较早向朝廷奏请变法。庚子新政诏令发布后，众多地方大员还在犹疑彷徨，揣测并打探朝廷的真实意图，他敢为天下先，倡言变政，其态度和主张相当激进。其建言多以制度兴革为内容，强调学习和模仿西法，这在同时期的朝臣疆吏中实属罕见。对于科举改革，他大胆主张由变而废，很快使之超越了戊戌年的改革力度。尤为重要的是，陶模的变法主张及其新政实践，有各派革新人士参与意见，不但显示戊戌与新政的历史渊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表达了社会革新势力的要求，在戊戌到新政的过渡交替中，起到促进与衔接的重要作用。

陶模是新政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封疆大吏。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壬寅初三日（1900年9月26日），上谕命两广总督鹿传霖开缺，以尚书候补，陕甘总督陶模调任两广总督，其时正值清廷被迫复行新政的前夕。

庚子事变后，清廷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对中央部院及各省督抚进行了大幅度人事调整，两广总督李鸿章调直隶总督，陶模也是被更调的九位督抚中的一员。据《德宗光绪实录》记载："二十六年闰八月乙卯十六日（1900年10月9日），调补两广总督陶模奏，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拟北上面奏下情。得旨：两广地方紧要，毋庸固辞。着俟驻跸西安后，听候召见。" 陶模未到任之前，由两广巡抚德寿署理两广总督。

陶模抵达广东时，新政已经开始。此时全国的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甫经戊戌失败及庚子之乱，趋新不行，守旧亦不利，地方督抚对于朝廷是否诚心提倡新政心存疑虑，徘徊观望，私下互通信息，揣度和窥测朝廷的真实动向；二是社会舆论及趋新人士对新政的关注和期待甚为殷切。表面的沉寂之下，冷热反差相当强烈。

正当多数官员尚在犹豫观望之际，刚刚履新的两广总督陶模于1901年2月正式呈递了关于新政的第一份奏议《奏请变通科举折》（注：陶模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901年2月9日（见其《到粤任事日期折》，收入《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变革科举始终是陶模变法主张的重心，1898年6月8日，他曾与甘肃学政夏启瑜联衔上《请变通武科折》，提出仿西法改革武科，特别要求："无论新章能否通行，旧例武科应一律停止，以归画一。"

陶模在两广大力推行"新政"之际，收到刘铸伯等自行捐资，拟开办育才书社广州分校的禀札，深感嘉道理与香港殷商"能捐此巨资，以助成教育之盛举，且能声明不课传教等书，本部堂方佩之愧之不暇，且将奖之劝之，俾粤省绅商士民，捐资建学之事，接踵而起"。陶模对刘铸伯的禀札与所呈办学章程做了批示。批示文字，见1901 年8月6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添课育才》一文：

> 港中创建育才书舍，省港各报均详纪其事，现刘绅鹤龄等复以此事原委及所订章程，具禀督辕，陶制府阅悉，大为嘉许，即批示云：该绅等联合同志，捐集经费，拟在广东省城河南及香港创设书塾三所，名为育才书社，招选聪颖少年肄习

中英文学等情。查兴学造士，实今日第一要图。惟和局甫定，两宫犹未回銮，是以学校一事，国家虽有意振兴，尚未暇广为开办。今该绅等为开通民智、裨益人才起见，集资数万之多，竭志经营，成斯善举，苦心毅力，深堪嘉尚。依利士·嘉道理以外国商人，久居中土，独捐银至四万，尤为慷慨，性成不分畛域，本部堂不胜欣慰，应即准予立案，并俟省城河南两书社择定地址后，再行禀请札饬该地方官给示照料保护，其一切办理情形，仍着随时禀报察核。再，阅所定规条，章程既密，界限尤严，诚为毫无流弊，惟第一条“专课中英文字”及“别有何课程可教者，由总理人择善而从”等语，查中西各学，门类繁多，断非文字一门能尽其用，尚须明定课程，添课各种有用之学，分班肄习，庶几材士辈出，上备国家任使，本部堂有厚望焉。

《香港华字日报》刊登《添课育才》的同时，还在同一版面“选录京报”栏目转载《陶制军培养人才疏稿》。

奉到陶模允准在广州开办育才书社立案批示后，刘铸伯再次在香港倡议捐款，并于1901年10月16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三日）与嘉道理、冯华川赴广州，专程拜谒封疆大吏陶模。这位封疆大吏对刘铸伯、嘉道理等人办学义举，再次大加奖掖，并捐助白银500两。1901年11月1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育才书社劝捐小引》称：

敬启者，本书社创办中西义学，实为作育人才，救时艰而开风气起见，在殷富者，延师课子，易于成材；惟贫窭之家，非无英俊，第已难谋俯蓄，奚暇筹及束脩？是纵有可造之才，亦将庸碌以没世，亦更虑聪明误用，流为邪匪，
贻害国家，以可为世用之人而反为世害，究心时局者，当共惜之，此本书社义学之设所由刻不容缓也。同人正议集款创办，适西友嘉君导理亦深韪斯旨，不分畛域，慨然助以巨资，而港中诸君子声应气求，又复同襄义举，业经联禀省大宪，呈请分设书社于省城河南等处，蒙批示准办各在案。

弟复于九月初三日，约同冯君华川、嘉君导理赴省，禀谒陶制宪，叨承奖饰，并蒙俯允为本书社粤省总主席，仰见大宪纡尊降贵、造士作人之至意，优渥逾恒，大雅扶轮，同深感戴。

育才書社勸捐小引

《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育才书社劝捐小引》（1901年11月13日）

惟是本书社虽筹有巨款，而港中已择地开办，计续办省城河南两处经费，恐属未敷。前月谒见省城列位绅商，幸均荷乐为将伯。语曰：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同人等咸嘉赖之，唯愿诸君子分携绿簿，广为劝捐，以成此善举，他时办有成效，进可为国家佐富强之治，退可为习俗化顽固之风，皆诸君子栽培后起，鼎力玉成之大德也，伏望见义勇为，裘成集腋，毋吝惜悭囊而罔怀大局，毋鄙夷同种而贻笑友邦，是则同人等所心仪而顶祝耳。

再，创办伊始，各善长恐未周知，除弟等沿门求捐外，如有乐助巨资愿为本书社总理者，请函致屈臣氏药房弟处手收，或旗昌行冯华川翁、渣甸行何泽生翁、万祥源阮荔邨翁、裕德盛叶蔼山翁、口口行梁仁甫翁，以便汇交弟收，谨当续登同人册内，合并附陈。

省城代收款项处：省城爱育善堂黄少雨翁，省城广仁善堂苏械农翁，省城广济善堂卢佐臣翁，河南仁济医局何尧卿翁、黄鸿远翁。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育才书社驻港总司理人弟刘铸伯顿首

《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羊城总主席暨列位总理芳名》（1901年11月13日）

这份《劝捐小引》后面，刘铸伯开列了育才书社“羊城总主席暨列位总理芳名”，并申明其余名单“陆续接登”。两广督部堂陶大人总主席，即是两广总督陶模，接着是龚仙洲观察、陈省三观察、沈树人观察、李直绳观察、沈石轩太尊、汪颂虞太尊、沈碧孙太尊、全丙炎太尊、王湘岑太尊、钱朴如太尊、蒋龄九直刺、许咏愚直刺、蔡道一别驾、斐伯谦太令、李星若太尊、徐小农大令、钟景瑜大令、李家焯太尊，此外，尚有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崇正善堂、广仁善堂、河南仁济医局各善长，以及广州黄若波、陈爱亭等善翁。

陶模虽然认为，育才书社设立总主席、副主席等名目，近于标榜，“且多列官士诸人，尤易蹈依附攀援之习”，但他对于嘉道理、刘铸伯这番联合同志，公襄义举之办学苦心，“奖励诚勉，未尝不具有深心”，并把刘铸伯办学禀札、育才书社规条，牌示南雄知州洪嘉与，嘱其协助办理。

洪嘉与（1863—1919），字贞一，号晓卿，江西省玉山县人，在科举考试中，县、府试均名列前茅。1885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次年任吏部主事。戊戌变法期

间，洪嘉与撰写《驳保国会章程》，逐条批驳保国会的 30 条章程，并对康有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1898年补吏部文选司主政，记名直隶州知州。八国联军入侵时，随慈禧太后和光绪出逃陕西。

在晚清时期，洪嘉与是个思想保守的官吏，其为人顽固，与后党官员一样，素以联俄为宗旨，而将“与英人交涉之事，无不目为阴谋，指为秘计”，庚子于行在上折，主张围攻使馆，触怒慈禧，要治其罪，光绪皇帝为其开脱说：“这个人是个傻子！”洪嘉与从此得“洪傻子”绰号。在兵部右侍郎的密折奏保下，洪嘉与又得光绪帝召见，分发广东委用。据《德宗光绪实录》（光绪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1901年1月1日）记载：当日“召见记名直隶州知州、吏部主事洪嘉与。得旨：着以直隶州知州发往广东，交陶模、德寿差遣委用”。

两广总督陶模（1835—1902）

对于刘铸伯所办育才书社欲在广州开设分校一事，洪嘉与向陶模呈文，竭力反对，指育才书社由英国商人嘉道理捐资，为英国包藏祸心，阴谋图粤；刘铸伯为屈臣氏买办，疑为孙中山、康有为余党潜谋不轨。陶模专札驳斥，认为“该牧迫于忠愤，为此思患预防之论，其心可嘉，然逆亿过甚，流于苛刻，足以滞志士之心，阻学堂之进步”，指其“阻碍学务，实非浅鲜”。

针对洪嘉与这份谬言满纸的呈文，陶模逐条痛批。他说，洪嘉与素以联俄为宗旨，对于英人交涉之事，无不目之为“阴谋”“秘计”。英国人办理的种种交涉，谁也不敢说其中不包含阴谋诡计，但是，如果中国能够自强，英国人的所有阴谋诡计皆无所用；如果中国不能自强，他们何止心怀阴谋秘计而已，而且早就明目张胆竞言瓜分，各国皆然，岂但英国？并且，“英人之在中国，商务独盛，势力本重，即以广东而论，香港、九龙亦既门户在握，何借一区区育才书社，为图粤地步？至谓借此为并吞扬子江及日豫之计，则尤愈说愈远。夫并吞扬子江及日豫，而先从一粤省之育才书社下手，英人当愚不至此”。

洪嘉与阻止育才书社在广州办学的一个理由是：嘉道理为自由党、无君党。这番瞎扣帽子的“指认”，实在令陶模哭笑不得，他说：“夫自由无君党，向为其政府之反对，政府无不恶之；而自由无君党，亦无不与政府为仇者，彼英政府岂肯以图华重任，付之其仇？而嘉道理既为自由无君党人，又安肯受其政府之指使，以来图我中国？”陶模举例说：按照洪嘉与的推理，现在孙文、康有为流亡英国，能够说是中国政府在指使

他们图谋英国吗？现在梁启超、徐勤流亡美国、日本，难道能够说是中国政府指使他们图谋美日吗？断然不会有这个道理，“揣该牧之意，或因嘉道理乃异国商人，忽捐资数万，以兴中国学堂，天下断无此慷慨好义之士，遂疑为包藏祸心，阴有主使，不知嘉道理特一好名之人耳。欧美各国捐资设学者，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在中国为绝无仅有之事，在泰西则视为寻常，况嘉道理为寓英之犹太国人，亡国馀民，素为英人所轻视，若以此数万金捐入英国学堂，曾不足动人耳目，惟捐于中国，乃可使远近称道，成此盛名”。

陶模认为嘉道理、刘铸伯出资兴学，或许出于名利之心驱使，他说，“至刘鹤龄等素业经商，忽思兴学，亦好名之念使然”，正所谓“无利不起早”是也。但是，他们办学此举虽然为名，却能捐出一笔巨资，以助成教育之盛举，并且声明学校里不讲授宗教课，“本部堂方佩之愧之不暇，且将奖之劝之，俾粤省绅商士民，捐资建学之事，接踵而起，乃该牧（洪嘉与）挟成心为兹苛论，一则曰英人主使，再则曰孙康余党，使有志兴学者见其如此，又谁肯解囊橐，以买恶名？阻碍学务，实非浅鲜”！

陶模说自己所担心的是，嘉道理、刘鹤龄等育才书社发起人都是商人出身，对于教育理法，平日未必专门细心考求，聘用的教师未知能否得人，他们所呈报的规条只谈到集款办事的办法，并未开列讲授怎样的课程。所以，他在此前批示刘铸伯等禀词中有“中西各学，门类繁多，断非文字一途，能尽其用，尚望严立课程，添课各门有用之学”等语。至于刘铸伯、嘉道理、冯君华川等专程赴穗谒见，推举陶模为广州育才书社总主席，一度被他婉拒。陶模说，设立总主席、副主席等名目，“近于标榜，且多列官士诸人，尤易蹈依附攀援之习。刘鹤龄等第二次来禀，欲推本部堂为总主席，即经批斥不准”。

陶模对于育才书社的建设，“奖励诚勉，未尝不具有深心”。洪嘉与对于《育才书社规条》各节的指责，实在令陶模百思而不得其解。如洪嘉与所称《规条》第一节“华人”“中国”等字全失华人语气等语，陶模批驳道：“刘鹤龄（刘铸伯）久在香港为商，该书社又从香港倡始，香港、上海等处学堂，向有中西人并教者，‘其资益华人起见’一语，乃为区别西人不入堂肄习而言，至于‘中国内地’四字，系与香港对举；且‘中国’字样，奏章公牍，亦所常用，有何关碍？”

洪嘉与对《育才书社规条》所言“专课英文”提出质疑，陶模反驳说：“今环球各国，惟英语最为通行，各种西学，亦以英文为详备。试观日本学校功课，皆首重英文，即北洋奏设之中西学堂，其头二等学堂功课，亦皆专教英文，不课别国语言文字。该书社专课英文，虽取径稍隘，究无不合之处。至国家前设同文馆，专为交涉储才，取四国语言文字并课，未尝以同文馆为国学，亦未尝谓建立学堂，必以同文馆为准则。即如前设之京师大学堂，其课程与同文馆迥异，今山东试办学堂章程，绝不仿照同文馆，而上谕颁令各省仿照，可见朝廷兴学，择善而从，并无成见。该牧谓初办学堂，不应与同文馆办理两歧，果何理耶？如谓专习英文，即求为印度、缅甸，夫一人精力有限，势不能兼通各国语言文字，是则习俄文者，求为西伯里亚，习法文者求为越南，习日文者求为

琉球，势必尽屏外国方言，无一学习而后可。”

针对洪嘉与的“英国阴谋恐惧症”，陶模说，现在出任钦使、参赞领事的洋务人员，通晓英语者众多，难道他们“皆不忠国家而求为印度、缅甸者耶”？法国在城内领事署内新建学堂，专课法文，高楼耸峙，学生百余人，洪嘉与难道没有听说过么？为何独于育才书社讲授英文疑虑无穷？“诚使英人欲干我学校之政，则照法人之例，在沙面等处开设学堂，谁能禁之？于内地教堂之内设立义塾，又谁能禁之？而必托名于嘉道理、假手于刘鹤龄，行此迂远艰苦之策哉？”“至港报译载之英人《论英国在华商务》一篇，该牧谓为阴谋之确据。查此论为利华浦商务会董所作，全篇皆言推广商务之事，所云第一要图，莫重于创设中西学堂一所，使少年子弟得悉中国形势，以及方言俗尚等语。既云‘得悉中国形势方言俗尚’，则所谓少年子弟者，乃英人之子弟；所谓中西学堂者，乃英人学中语之学堂，而非华人学英语之学堂，语意甚明，该牧何致信口雌黄？”

《育才书社规条》第二节提出：“本社社友，俱有权用育才书社名字，及本社印戳，代本社置地及屋宇物业。”还说：“捐助经费不在百元以下，或每年认捐五十元，方为社友。”这本来是为了招徕捐项起见，该书社如有讼事，或准或驳，其决定权在官府，不能因其有“社友代质办理”一条，遂为枉断。但是，洪嘉与却说是“大侵利权”，陶模批驳说：“无乃太过？”

至于洪嘉与指斥《育才书社规条》用西历年月日“阴借传教”，批评育才书社设置主席、司理、总理等头衔，“全权办理书社诸事”用语失当等，陶模也一一予以驳斥：

> 香港商人在英属日久，皆习用西历年月，规条第二节所云“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廿五号”数语，系言公举总理之事，其时尚未来省，禀开学堂，则举此年日，自系告知在港诸人；第十二节“所有已捐之款，须于某年某月某号收讫”一语，亦系专为香港捐资诸人而言，必言西历年月者，取其习用易知而已。其序文及规条之末，并无西历若干年字样，谓为“用耶稣纪元，阴借传教”，亦殊失实。
>
> 至该书社主席等名，大抵以捐资多寡为轻重，嘉道理捐资独多，居该书社经费之半，故推为永远主席，其实社中办事，皆司理、总理等人主持，观其规条可见，即如总主席之名，本部堂虽辞而不受，亦可知该书社之推举主席，不过富贵之见未除，并非专举西人也。夫开办学堂，沾沾于捐数之多寡（募），诚非雅道，惟当此民智未开，创始非易，该书社为集款起见，委曲迁就，亦有苦心，当原谅之，不必责备之也。
>
> 至“全权”二字，本从西文译出，今议和之有“全权”，亦系改从西例。西人办事，最重权限，近译之公司章程等类，往往有“全权”字样，祇言其人管理此事之权，完全无缺，如总理有“全权”，分理无“全权”，是“全权”者别乎“不全之权”而言云尔。该书社规条，既据该牧谓从西文译出，则“全权”二字亦不足怪。况彼明明言“全权办理书社诸事”，是书社之外，即非彼权力所及。其第九节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收录《两广总督陶制军批斥洪牧嘉与札稿》

新例诸语，亦专就书社言之，无所谓太无限制。该书社既在香港倡始，则总社设于港地，以及在港聚议，亦所应尔，遽目为潜谋不轨，收人都会之举动，过矣。

总之，刘鹤龄等久居香港，素习西文，书社规条系在香港所定，其词气字面，与中国章程文法，自不相同，此等处即不惬吾意，好言与之商改可矣，何遽盛气凌人，危言动众，甚至谓“二十行省之土地，政府之权力，不足供其篡夺”，毋乃拟于不（于）伦、立言过当乎？

又，该牧谓此事与英人骗取日省路矿相似，且以戊戌之变、拳匪之祸，并归罪于胡中丞，此与该牧前在行在所上折稿所云“胶澳之割，咎由鄂督”，同一深文周纳（内），虽使汉唐酷吏断狱立谳，不至如此。夫有嘉道理在内辄疑该书社为英人阴谋，然则今之税务司，无一而非西人，该牧以为何如？又如俄国官吏，多以德人为之，日本变政无事，无欧人在内，使中国用人，照此办法，该牧又以为何如？

刘铸伯的屈臣氏买办身份，也成了洪嘉与攻击育才书社在广州开办分校“包藏祸心”的口实。他对刘铸伯进行了一番莫须有的指控，暗示刘铸伯可能是孙中山、康有为的党羽。陶模驳斥道：

至谓刘鹤龄（刘铸伯）屈臣氏买办，疑为孙文徒党，亦近捕风捉影。香港之为买办者多矣，皆党于孙文者乎？且由此而拟为康党，则尤为牵扯。本部堂只就事办事，以息乱萌，不敢以成见私心，株连蔓引，盖孙、康既皆粤人，一则行医，一则教馆，粤之士商为所识者多矣，苟于士商之有志时务，讲求新学者，概疑为孙、康之党，善机阻塞，何以振兴？且疑惧万端，纷纷自扰，康衢坦途，尽成荆棘，将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为矣！夫中国今日如久病者，然苟能振奋精神，调和营卫，正气既足，则日光空气，非特不为患害，且可为养生之助，如其不知保行口益就王羸（羸），徒日日恐寒暑燥湿之侵犯，虽闭户下帷，日卧床榻，疾弥甚耳。

总之，陶模以是否有利于变法自强为评判标准，高度评价刘铸伯等人的办学义举。

在他看来，新党各派均系有识之士，应当争取，顽固守旧派则为革新设置障碍，必须扫除。考虑到清廷直到1904年才解除党禁，将孙文和康有为、梁启超以外的戊戌分子开复启用，陶模则在1901年便具有这样的认识，并在职权范围内贯彻实行，的确难能可贵。

此外，陶模还翻出洪嘉与在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糗事，嬉笑怒骂了一通。最后说：洪嘉与“既以忠爱自期，务宜平心静气，以察事理，毋预存成见而遇事辄苛求，毋自视过高而谓人皆不肖。夫论有用人才，必曰‘通达时务、讲求时务’，而不通达，成事不足，败之有余矣”。这话等于直白地说，洪嘉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通批斥洪嘉与的札稿发出后，洪嘉与适逢父丧，回籍“丁忧”守制去了。开办育才书社广州分校的拦路石，总算搬开了。

洪嘉与回江西玉山县守制期间，恰逢全国废书院办学堂，或许当初受到两广总督陶模的棒喝，他以翰林身份领衔倡议，于1903年开办县城第一所高等小学，并任该校的堂长。还资助怀玉、端明两书院和信州中学办学，组建带有职业学校性质的亲民学堂，对儿童进行“课读教识”。因此，时贤赞誉他是“玉山新学第一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洪嘉与“北面涕泣，肝胆莫陈”，急电徐世昌代奏“终守臣节，愿效无二”之志。此后他携母隐居上饶鸡炉峰三年，自撰门联“多病一生常傍母，孤臣万里不忘君”，做了一段不食周粟的孤臣遗民。后来，洪嘉与回到玉山，又着手兴办了各类初高等学校、明德学校、艺仁实业学社、洪氏教育会社。1921年病逝于老家松树窝，终年五十八岁。

但在育才书社筹办过程中，两广总督陶模病逝于任所。1902年10月21日，《申报》刊发《星陨南天》一文，略谓：“前任两广总督陶芷芳制军薨逝之信，本馆前已照西报译登。兹阅广州中西新报云，制军卸篆后，陡于九月初九日丑刻殁于城南运宪行辕，二公子随侍粤中，抢地呼天，擗踊泣血，一时督抚以下文武各官，咸具一束生刍前往吊奠。”文内“一束生刍”典出《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朱熹集注有云：“贤者必去而不可留矣，于是叹其乘白驹入空谷，束生刍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

陶模病重辞差前，与广东巡抚德寿联衔的最后一份奏章，仍是敦请朝廷关注科举妨碍兴学，主张采取果断措施改变现状。陶模的执着，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趋新人士的赞扬。1902年11月7日，《申报》刊发《陨天南天》一文，其中谈到：“自合肥李文忠、新宁刘忠诚二公相继薨逝，中兴名将相大半沦亡。谈时事者，慨叹国步之艰危，人才之消乏，欷嘘叹息，怒焉忧之。不意两广总督陶芷芳制军，又抱沉疴，骑箕而去，飞来籍隶僵电，坠陨大星，四海人民，无不同声感恸……”